# 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

## ——国外信息素养研究新进展

■ 颜先卓
宁波大红鹰学院图书馆 宁波 315175

**摘要:**[**目的/意义**]针对当前国外信息素养研究新进展,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情况进行系统介绍,旨在为国内信息素养研究提供思路与借鉴。[**方法/过程**]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研究维度 3 个方面进行介绍,并对国外该领域研究特点进行归纳,对相关研究趋势进行展望。[**结果/结论**]研究分析显示,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是当前国外信息素养研究新的生长点;促进不同学科、行业之间对信息素养理解的统一是该问题研究的主要推动因素;该项研究对促进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改革、信息素养概念化反思以及信息素养与职业特征结合等方面有所帮助。

**关键词:**工作场所信息素养 国外 综述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8.12.017



## 1 引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信息行为模式和认知习惯,并推动了信息素养研究的不断拓展。随着不同社会环境中信息行为与技术应用的差异性被不断认知,非学术环境下的信息素养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不同学科、行业之间对于信息素养的理解存在偏差,特别是教育管理部门与就业部门在信息素养问题理解上差异明显。M. B. Zorica 等指出,尽管信息素养作为一种通用技能对于毕业生就业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教育者与企业管理者在信息素养描述上缺乏共同语言,从而影响了双方对问题的认知[1]。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研究者围绕"信息素养在工作场所的体现"等问题,在对学术环境中信息素养概念化反思的基础上,对工作环境中信息素养的概念、构成、表现、评价以及培养等问题展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理解个体信息行为、重新审视信息素养内涵以及扩大信息素养研究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研究在国外信息素养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相比较而言,国内信息素养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如概念、评价、意义等)。尽管国内学者对于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给予较多关注,对教育领域之外的信息素养以及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对于学生就业能力与职业发展的影响却鲜有论及。个别国内学者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体现在对企业员工信息素养的关注,包括技术性构成[2]、评价维度[3]以及核心能力[4]等方面,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近年来,随着高校信息素养教育面临困境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国外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关注度逐渐增加。2016 年,第 4 届欧洲信息素养会议将工作场所信息素养问题作为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强调信息素养教育对毕业生就业能力与职业发展的支持,并将其视为信息素养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5]。目前,该领域研究尚未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对近年来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进行综述,以帮助相关领域研究者全面了解已有成果,深化未来研究。

## 2 研究分布、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某一领域文献随时间的分布与变化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出发点;所采纳的基础理论则体现了研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融入式创业能力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6NDJC096YB)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颜先卓(ORCID:0000-0002-3857-2763),馆长,副研究馆员,E-mail:xyzyan66@163.com。
收稿日期:2017-10-12 修回日期:2017-12-06 本文起止页码:135-142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究的主要视域和核心意义[6]。因此，本文选择从上述3个方面对国外研究概况进行梳理。

## 2.1 文献增长与学科分布

为较为完整地搜集国外相关研究文献，本研究选取以下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Springer LINK、Web of science、Elsevier（Science Direct）、PQDT（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 Theses）、EBSCO、Ei Village。使用的检索式为"主题词 =（Information Literacy）AND Workplace"。检索年限不限，检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最终得到文献 103 篇。

数据统计发现，国外对于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的关注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2000 年以前文献较少，之后文献数量显著增加。特别是 2010 年以后，国外对于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的关注保持了持续的热度，相关研究文献于 2016 年达到一个顶点。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相关文献的时间分布

从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来看，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科学领域，其次为图书馆学和教育学，另外在管理学、商业与金融学、计算机科学、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学、计量学等学科也有涉及。具体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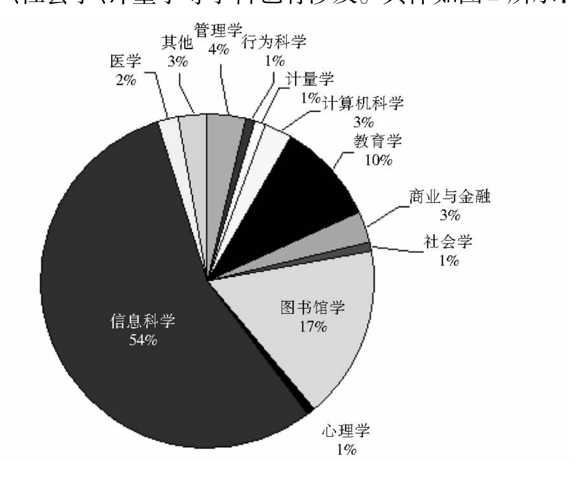



图 2 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文献来源期刊所属学科领域

在相关文献来源方面，有 39 篇会议论文。2010 年以后，欧洲信息素养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ECIL），国际教育、研究与创新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CERI）都曾把工作场所信息素养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该问题研究受到相关行业协会和专业组织的关注。在期刊文献方面，载文量较多的期刊中属于信息科学的有 7 种，均为国外较为重要的图书情报领域的专业期刊，表明该问题受到国外图书情报领域的关注。如表 1 所示：

表 1 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文献来源载文量排名

| 序号 | 文献来源 | 类型 | 文献篇数 |
|---|---|---|---|
| 1 |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2016） | 会议 | 14 |
| 2 |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2013） | 会议 | 8 |
| 3 |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2014） | 会议 | 6 |
| 4 |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icence | 期刊 | 4 |
| 5 | Journal of Business & Finance Librarianship | 期刊 | 4 |
| 6 |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 期刊 | 3 |
| 7 | Education Libraries | 期刊 | 3 |
| 8 | Electronic Library | 期刊 | 3 |
| 9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期刊 | 3 |
| 10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 期刊 | 3 |

## 2.2 概念界定

2.2.1 工作场所信息素养 研究者对于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的定义依据研究目的呈现不同表述，但其都建立在对工作场所实践活动分析的基础上。J. Kirton 与 L. Barham 认为工作场所信息素养是指找到、访问和应用信息以协助解决与工作有关的挑战的能力，具体包括对信息属性的理解，对信息源的评价，对信息经济特征的理解，对信息价值与成本有效性的判断，对信息需

求、信息过载以及信息过滤的有效定义,对信息社会背景的理解,对人际关系的判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工作关系)以及对客户的导向和关注等[7]。T. Travis 认为工作场所信息活动是受工作性质、环境以及组织内部工作人员影响的基于目标分享和专业协作的综合体验过程,在此情景下,由于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类型和使用策略并非通用,组织和个体双方将共同决定信息行为,协商性、动态性和情境化成为信息活动的基本特征,因此,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关注工作环境中信息需求、获取和评估的现实情景以及非正式学习对个体在理解和利用信息方法上的影响[8]。J. Sokoloff 将工作场所信息素养描述为工作环境下完成工作任务和实现工作目标相关的信息处理能力,同时指出工作场所信息素养通常被组织管理者理解为技术和沟通能力[9]。

2.2.2 信息景观 在国外研究中,与工作场所信息素养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是信息景观(information landscape)。A. Lloyd 认为信息素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与社会领域内其他实践相互嵌入和交织,受协作性活动的支配,因此,应将信息素养研究置于一定的语境(context)或情景(setting)中,并称之为"信息景观"(information landscape)[10]。信息景观是指特定的交流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个体通过共同的实践和行为方式发展身份并建立联系,以个体间的互动实现信息的创造、共享和沉淀。根据空间内信息交流、共同实践以及个体发展身份方式的不同,信息景观可以分为学术学习环境(高等教育领域及学术图书馆)、工作场所、公共图书馆与社区等主要类型。如 R. Monge 与 E. Frisicaro-Pawlowski 指出,在高校教育及学术型图书馆情景中,图书馆员和学科教师根据专业组织编撰的标准性框架实施教育活动,这种以正式学习为主的环境可以称为"学术学习环境"(academic learning environments),并认为该种环境是当前主要的信息景观[11]。

现有文献阐述了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实践与情景的信息素养研究范式。本文基于该概念的研究试图解释教育管理部门与就业部门对于信息素养的理解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不同信息景观之间信息素养转换问题。

## 2.3 理论研究

目前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尚未搭建起完整的研究框架。研究者从不同方面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的内容、价值以及研究的理论、方法、案例进行探讨,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包括信息科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管理学等多学科内容。相关研究采取与之相对应的理论视角展开考察,主要集中在实践理论与学习理论两方面。

2.3.1 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起源于哲学领域,在哲学、教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研究中得到体现。当前实践理论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的影响并非是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而是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

T. R. Schatzki 从"社会站点"(social site)等概念出发,论述了信息素养与实践环境的相关性。其理论认为,社会生活是持续的实践活动,个体通过"社会站点"的实践来了解生活,信息素养产生的原因与性质都是基于实践,是对知识构成与认知方式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结果,信息素养研究需要将实践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站点,并关注在每个站点中实践如何呈现、实践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实践产生影响的社会与物质条件。根据该理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settings)中,知识类型与认知方式的合法化是由个体语言和行为来塑造和维持的,工作场所的知识(包括信息素养)是该环境中所有成员的语言、行为体验和行为方式共同协商的结果,并且这种结果的形成是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因此工作场所信息素养与环境密切相关,建立在对特定环境中知识类型和认知方式共同理解的基础上[12]。

E. Wenger 以"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概念为分析工具,从社区(community)、实践(practice)、意义(meaning)和身份(identity)4 个维度对社会实践进行分析,并着重强调了"参与"(participation)和"意义协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的作用。他认为历史与社会环境赋予社会实践结构与意义,独立的意义以及普遍的意义都是不存在的,意义的分享、协商与发展都是在一定"实践社区"之内,实践意义的赋予是通过"意义协商"来实现,这种协商不局限于意义的交换,同时还包括对意义语境的解释。该理论将实践社区视为一种影响协商能力的范围或制度,信息素养意味着个体所具有的协商能力。在实践社区内,个体具有不同的"身份",在实践中发展能力的基础是对特定知识的分享[13]。

A. Lloyd 强调了实践过程中知识的集体所有性。他以护理职业为例,指出新手(novices)职业实践相关知识的获得离不开熟手的帮助以及对规范知识的学

习,为达到这一目的,新手需要参与信息素养相关实践,识别工作场所中合法的知识类型与信息来源。新手应该认识到工作场所中知识的集体所有性,学习与工作景观相关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并发展可识别的工作场所身份[14]。

实践理论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具有以下启示:①知识类型与认知方式合法化具有相对性,是存在于“社会站点”或“实践社区”之内,因此实践中信息素养的含义与构成也是相对的。②特定环境中的知识是一种集体所有,是在共同理解基础上的“意义协商”的结果,信息素养可以理解为个体所具有的协商能力的组成部分。③语言、行为、知识类型、认知方式以及身份都与信息素养有关。综合来看,实践理论为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实践理论对于信息素养研究意味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

2.3.2 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对于信息素养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国外研究者从非正式学习和工作场所学习相关理论出发,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研究者从非正式学习理论强调学习与情景之间的联系出发,推导出信息素养与情景的相关性。如 J. Sokoloff 认为,传统研究对于信息素养与职场环境相关性的忽视是造成教育管理者与就业指导者对于信息素养认知脱节的主要原因,这种脱节既包括研究术语与评价体系的脱节,也包括实践层面上的脱节。S. E. Eaton 认为与正式学习的等级式相比,非正规学习(non-formal learning)和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具有更高程度的协商和转换性质,更符合工作实践要求,相关理论可以为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提供支持[15]。C. Bruce 等把 21 世纪信息素养教育描述为一种“知情学习”(informed learning),强调情境化,专注于驱动变化的知识和对实践的反思,认为知识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学习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16]。

基于“情境化”在工作场所信息素养概念中的重要地位,工作场所学习理论成为国外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R. Monge 与 E. Frisicaro-Pawlowski 认为当前信息素养教育的短板之一是将信息情景简单化处理,对学生毕业后所面临的复杂信息环境考虑不足,同时教育目标设置与主体关系没有充分考虑职场特点,从而使信息素养从学术环境到职场环境的转移受到限制,并认为工作场所学习相关理论可以为这一问题解决提供思路[11]。J. A. Realin 总结了工作场所学习的三大要素,包括学习发生在行动和任务执行的过程中、知识的创造和利用来源于集体活动和学习者必须掌握学会学习的能力[17]。L. Brennan 对其内涵进行了更为形象的概括,认为工作场所学习是指在工作中学习(learning at work)、通过工作学习(learning through work)、为了工作学习(learning for work)和基于工作经验的学习(learning from work)[18]。整体上看,工作场所学习理论在强调信息素养教育与情景关系的同时,认为基于目的考虑,信息素养研究同样需要认识到就业能力及职业发展能力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意义。

## 3 分析维度

国外学者对于工作场所信息素养问题的认识呈现多样性,不同研究者基于各自目的和方法从不同维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

### 3.1 基于学习理论与教育理论的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反思

研究者认为,工作场所信息活动与高校环境中的信息活动是不同的,传统信息素养教育侧重对高校环境的适应,从而弱化了对于学生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的帮助,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正是解决这一问题。如 A. Lloyd 认为,目前高等教育领域流行的信息素养的概念具有面向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和正式学习(formal Learning)的基本特点,由于学校教育的高度程序化,高校环境中学生以教师所希望的方式去发现和传播信息,教师以标准化的内容(如论文或报告)和程序(如发表)作为评价标准,从而造成信息活动以及信息素养评价处于一个闭环之内。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主要是帮助学生利用一套稳定且统一的工具,如数据库、搜索策略和学术期刊,而并不是以适应工作环境为目的的通用性的信息技能,这就造成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对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的作用乏力[19]。A. Sfard 从学习理论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化,认为在正式学习过程中,概念化的信息被分解为基本的单元,学习活动的作用是赋予基本单元信息以创造更为复杂的单元,这些复杂单元作为知识被识记并在需要的时候加以利用,高校信息素养框架建立在这些知识单元的基础上,一方面希望发展适应任何环境的通用型技能,一方面又强调信息获取与应用的特殊性,其结

颜先卓. 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国外信息素养研究新进展［J］. 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2):135－142.

果是信息素养实践的复杂性被减少,关注重点成为如何描述信息技能而不是所处信息景观的社会特征,这就造成了信息素养教育与实际效果的脱节[20]。

对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反思是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信息素养概念化以及对现实情景的忽视是相关研究者的主要批评点。持有该类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信息素养研究需要突破传统学术环境的束缚,采取"信息景观"的研究范式并在信息素养框架设置上包含与工作环境相关的内容。

### 3.2 对信息素养研究规范和价值观的重新定位

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体现了对信息素养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的重新思考,以及信息素养研究规范和价值观的重新定位。研究者认为,在教育环境中,信息素养被视为教学对象和学习对象[21],体现为信息素养教育以及图书馆相关技能教育对学习干预的有效性[22],这与教育环境中学习是所有活动的主要目标的实践特征是相符合的。但在工作环境中,信息素养面临与专业融合的挑战,过分强调信息素养概念的独立性,存在使信息素养与专业领域脱节的风险[23]。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发现,当前国外信息素养研究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预设信息素养的概念,认为信息素养是可以学习获得的一套技能或能力[24],其结果可以通过"客观测试"来衡量[25];另外一种是不预设信息素养的概念,信息素养被理解为在特定环境中已经存在或正在发生的活动,信息素养研究的任务是理解和揭示它[26]。如 R. T. O' farrill 认为信息素养不能被视为一种通用技能,需要与具体的语境和实践相结合,工作环境下信息素养不能被预先定义[27]。A. H. Lundh 等指出,工作场所信息素养只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而非目标本身,基于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在研究参与者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时,很难预设清晰的信息素养概念,并认为这是"真实世界"信息素养与学术环境下标准化的信息素养的差别[28]。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别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种研究方法的比较

| 涉及内容 | 评价的方法 | 探究的方法 |
|---|---|---|
| 信息素养概念化 | 预定义 | 事后定义(post-defined)或没有定义 |
| 概念化的基础 | 外部标准制定 | 对某一社会实践的实证研究 |
| 研究者的作用 | 评估信息素养 | 理解和说明信息素养是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出现和发生的 |
| 理论基础 | 关注个人 | 关注社会和政治方面 |

### 3.3 对信息素养与就业能力联系的揭示

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揭示信息素养与就业能力之间的联系。J. Crawford 和 C. Irving 认为,信息素养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联系,而当前研究对于这种联系的揭示还不够[2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学校教师缺乏对工作场所信息环境的了解,从而使学校相关教育无法转化为工作技能[30];对信息素养相关的工作场所属性理解不足,信息素养定义存在偏差[31]等。研究者认为,对信息素养与就业能力联系的揭示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在工作场所普及信息素养概念并推行相关教育,如 B. Cheuk 建议在工作环境中推广信息素养概念和教育方法,以发掘信息的商业价值和应对信息过载的挑战[32]。二是信息素养研究增加对工作场所属性的关注,如 H. Taylor 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商业领域一个关键属性,应该成为信息素养的要素;X. Zhang 等认为对信息环境扫描的相关能力应该成为信息素养相关的工作场所属性[33]。

### 3.4 结合行业特征对信息素养的分析

通过与具体行业相结合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进行分析是国外该领域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如 A. Lloyd 与 K. Williamson 以消防员工作环境的实践特征为基础,对消防员信息素养进行了调查分析[34];J. GRAHAM 与 G. W. SEMICH 在对英国社会护理专业人员在信息搜集过程中行为进行偏好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护理人员的技能提高与知识更新问题[35];J. R. Eckerdal 通过对助产者和年轻女性的访谈,分析了卫生保健情境中个体对信息素养实践特征与有用性的理解[36];R. T. O' Farrill 通过对政府健康信息和咨询呼叫中心护士的访谈与调查统计,从工作人员的角度描述了对信息素养的理解,并就传统信息素养标准框架的相关性和适用性进行了检视[27]。

## 4 总结与展望

文献分析显示,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具体维度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逐渐成为信息素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相关研究的开展以及相关项目的实施为信息素养研究的发展提供动力。

### 4.1 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特点分析

综合分析,当前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具有

以下特点：

4.1.1　具有生长性　专业组织与行业协会是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重要推动力量，ECIL 和 ICERL 连续将工作场所信息素养问题纳入年会主题对于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自 2000 年以后，相关研究论文不断增加，随着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增加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得到关注，工作场所信息素养问题也将会受到持续关注。

4.1.2　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性　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旨在解决传统学术环境下信息素养研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因此，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成为国外该领域研究的重要特点。在理论基础方面，国外研究将实践理论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基础理论，尽管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对工作场所信息素养问题展开讨论，但实践理论的影响是带有普遍性的。在研究目的方面，研究者把信息素养研究与信息素养在就业能力与职业发展影响上的偏差视为研究的主要目的，这本身针对的就是一个实践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结合具体职业大量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注重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一些研究直接与行业信息素养培训项目相结合，将实际效果作为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4.1.3　体现跨行业特征　传统研究尽管将信息素养视为信息社会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素养，但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与科研领域，体现其他行业特征较少。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则更多地体现了跨行业特征。一方面，该领域研究把对学术环境下信息素养研究的反思作为研究的基本切入点，从工作环境整体特征入手开展相应分析；另一方面，大量研究与具体职业相结合，使信息素养研究体现行业特征。

4.1.4　对传统信息素养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尽管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将信息素养置于不同的“信息景观”之内进行区别分析，但仍遵循利用信息技术、技能和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逻辑，体现出信息素养研究的一般性特征。所不同的是，该领域研究将信息素养置于具体情景中考量，对信息素养的描述更为具体。同时，研究者对信息素养概念化的反思以及对信息素养是否可以进行预先定义的探讨使信息素养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

### 4.2　研究展望

通过对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整体分析，本研究认为该领域研究将会对以下方面产生进一步影响：

4.2.1　为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当前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以提高学生素质和学业完成为主旨，在促进毕业生就业和职业发展方面作用有限，在教育实施方面以信息检索课程为主。尽管信息素养教育与学科教学整合程度在不断提高，但信息素养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尚未起步。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在研究视域上体现出更高的整合性，该领域研究体现出对信息素养实践性理解的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将会为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外学者从教师角色（包括图书馆员角色）、教学内容设计与教育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如提出建设反映雇主需要的信息素养课程[37]以及在学术框架内实施体现工作场所特征的信息素养项目[38]等。该方面研究将会是未来信息素养研究的重要方向。

4.2.2　对信息素养概念化进行反思　对信息素养概念的理解是信息素养研究的核心问题，不仅决定该领域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是相关标准或框架确立的基础。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在信息素养概念化问题上体现出不同观点：在定义方式上提出事后定义（post-defined），即相关研究不以统一的预先定义为讨论基础，而是根据行业特征或研究方法进行事后定义，从而使对信息素养的描述更为具体；受此影响，相关学者也认为传统信息素养概念在内容上主要体现更多学术特征，需要补充职业性内容的描述。对信息素养概念化的反思是目前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该方面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

4.2.3　与职业环境进一步融合　当前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体现出与具体职业相结合的基本特征，相关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卫生、法律、公共服务等领域。在这些领域内，信息服务是相关职业工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相关研究项目集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增加更多的研究样本，如对企业、商业、服务业以及信息行业等新兴行业工作环境下信息素养相关问题的了解，这将会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5 结语

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信息素养研究的深入使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成为国外该领域研究的新兴领域，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以及研究维度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目前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对相关研究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对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对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影响力的探究是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兴起的重要推动因素；该领域研究吸收实践与学习等相关理论，扩充了信息素养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信息素养概念化的反思以及将信息素养与职业特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为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借鉴。在专业组织和行业协会的推动下，国外工作场所信息素养研究呈现上升态势，相关研究值得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者关注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ZORICA M B, ŠPIRANEC S, BUŠELIC V. Are we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Croatian employers' IL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for prospective employees[C]//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Heidelberg: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99－108.

[2] 郑丽娟. 关注企业员工基本信息能力的培养[J]. 商场现代化，2007(2):273－274.

[3] 王壮. 企业知识型员工信息素养培养模式多维度构建研究[J]. 情报科学,2009(6):812－815.

[4] 赖茂生,赵康. 企业信息管理人员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研究[J]. 情报科学,2010(7):961－965.

[5] COLLARD A S, SMEDT T D, FASTREZ P, et al. How is information literacy related to social competences in the workplace? [M]// Information literacy: key to an inclusive societ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79－88.

[6] 王芳,张鑫,翟羽佳. 国内外信息源选择研究述评及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3):96－116.

[7] KIRTON J, BARHAM L.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workplace [J]. 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2005, 54 (4):365－376.

[8] TRAVIS T. From the classroom to the boardroom: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on workplace research skills[J]. Education libraries, 2011,34(2):19－31.

[9] SOKOLOFF J.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workplace: employer expect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 finance librarianship, 2012, 17 (1):1－17.

[10] LLOYD A. Information literacy landscape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education, workplace and everyday contexts[M]. Chandos:Oxford, 2010.

[11] MONGE R, FRISICARO－PAWLOWSKI E. Redefin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21st century workforce[J]. 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2014, 39 (1):59－73.

[12] SCHATZKI T R. The site of the social: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everyday life[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2.

[13] 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social learning systems: the career of a concept[C]//BLACKMORE C. Social learning systems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s. London: Springer,2010: 179－198.

[14] LLOYD A. Informing practice: information experiences of ambulance officers in training and on-road practice[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9,65(3):396－419.

[15] EATON S E. Formal,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the case of literacy, essential skills, and language learning in Canada[M]. Calgary :Eaton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Inc,2010:36.

[16] BRUCE C, HUGHES H, SOMERVILLE M M. Supporting informed learn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Library trends, 2012, 60 (3):522－545.

[17] RAELIN J A. Work-based learning:bridg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the workplace[M]. 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8.

[18] BRENNAN L. Integrating work based learning into education: a guide to good practice[R]. Bolton:University Vocational Awards Council,2005.

[19] LLOYD A. 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 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66 (2):245－258.

[20] SFARD A. On two metaphors for learning and the dangers of choosing just one[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98,27(2): 4－13.

[21] PILEROT O, LINDBERG J.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policy-making texts: an imperialistic project? [J]. Library trends, 2011,60(2): 338－360.

[22] WALTON G, HEPWORTH 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anges in learners' cognitive states during and following an information literacy teaching intervention[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1, 67 (3):449－479.

[23] JULIEN H,WILLIAMSON K. Discourse and practice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gaps and opportunities[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1,16(1):95－116.

[24] CHU S K W, TSE S K,CHOW K. Using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inquiry project based learning to help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develop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skill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1,33(2):132－143.

[25] GROSS M, LATHAM D. Experiences with and perceptions of information: a phenomeno graphic study of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J]. The library quarterly,2011, 81(2):161－186.

[26] MORING C. Newcomer information practice: negotiations on infor-

mation seeking in and acros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J]. Human IT,2011, 11(2): 1-20.

[27] O'FARRILL R T.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at work: conceptions of effective information use at NHS24[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66(5):706-733.

[28] LUNDH A H, LIMBERG L, LLOYD A. Swapping settings: research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workplace and in educational contexts[EB/OL]. [2017-09-05]. http://informationr.net/ir/18-3/colis/paperC05.html.

[29] CRAWFORD J, IRVING C.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employability training: the experience of inverclyde libraries[EB/OL]. [2017-09-05]. http://www.therightinformation.org/about/.

[30] EYRE J. Context and learning: the value and limits of library-based information literacy teaching[J].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2012, 29 (4): 344-348.

[31] TAYLOR H L.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subject-specific vocabularies: a path to critical thinking[J]. College & undergraduate libraries, 2008, 15 (1/2):141-158.

[32] CHEUK B. Delivering business value through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workplace[J]. Libri, 2008,58(3):137-143.

[33] ZHANG X, MAJID S,FOO S. Environmental scanning: an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s at the workplace[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0,36(6): 719-732.

[34] LLOYD A,WILLIAMSON K.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ontext: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 information science, 2008, 40 (1):3-12.

[35] GRAHAM J, SEMICH G W. A model for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technology across the curriculum: a three-step staff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transforming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2008, 2 (1):1-11.

[36] ECKERDAL J R. To jointly negotiate a personal decis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practices in midwifery counselling about contraceptives at youth centres in Southern Sweden[J]. Information research,2011,16(1):5-8.

[37] REEDY K, MALLETT E, SOMA N. iKnow: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t work [EB/OL]. [2017-09-05]. http://iknow.open.ac.uk/docs/IKnow%20Final_report.pdf.

[38] WATERS N, KASUTO E, MCNAUGHTON F. Partnership between engineering libraries: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s for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from student to professional[J]. Science & technology libraries, 2012, 31 (1):124-132.

## Research on Workplace Information Literacy: New Progres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Abroad

Yan Xianzhuo
Library of Ningbo Dahongying University, Ningbo 31517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view of the new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abroa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workplace, aiming at providing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hina. [**Method/process**] By adopting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alysis of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re concep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dimensions three aspects,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the trend related research is prospected. [**Result/conclusion**]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workplace is the new growth point of foreign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It i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of this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un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has helped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conceptual reflec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v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workplace information literacy  abroad  review